

第一章

近代藏书文化产生的背景

第一节 近代社会变迁对藏书的影响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国近代百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均与此前的封建社会有了差异，而这些变化对中国近代藏书活动以及基于此建立的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均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因而了解中国近代社会背景，是把握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发展、演变脉络的关键之一。

一、政治因素

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改革对近代藏书活动和藏书文化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清朝道光年间，在清朝封建政权日渐衰落的同时，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而日益强盛，并开始向外扩张。经过中英鸦片战争的较量，中国败下阵来，以后便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与动乱。在近代 100 余年中，既有贯穿于近代各时期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日本入侵中国等侵略战争；也有多发于近代前中期的国内农民革命、少数民族起义及反洋教斗争等；还有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兵匪之乱等。近代社会战争与动乱交替，对中国藏书建设等文化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外患内乱，使封建政权岌岌可危，自顾不暇，

对国家藏书疏于管理，任其佚失；毁于战火的藏书更不计其数。较著名者，在南方有毁于太平军与清军作战中的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大量私家藏书也在此时损毁散佚。在北方，有 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所焚毁的圆明园文源阁；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官私收藏损毁无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逊帝溥仪能借机将原皇家旧藏典籍盗运出宫。民国时期政权迭更，不仅使前清遗老生活失去保障，新兴官僚政客亦迁降频繁，使私家藏书聚散之频率较古代社会大大加快。此后军阀混战，兵匪肆行，著名的山东聊城海源阁等私人藏书难免劫运。日本入侵中国，更使全国公私典籍受到空前的摧残与浩劫。

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运动对近代藏书活动也有深刻的影响。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为巩固、振兴封建政权而实施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如设立译书局、创办官书局等新举措，对中国近代藏书活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1862 年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1863 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广州的方言馆、福州的水师学堂，均翻译了一些西方有关工艺制造、自然科学和国际关系等的著述，对开拓近代中国人的视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翻译书的出现，使中国图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曾国藩等以重兴文化为名，在原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大办官书局，如金陵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淮南书局，接着又有福建、江西、河南、山西、山东书局及广东的广雅书局和湖北的崇文书局相继成立。为了“正人心”、“维世道”，官书局首先刻印“钦定”、“御纂”书籍，其次为正经、正史及诸子文集。官书局刻书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也使中国传统古籍得到保存和流传。

洋务派所出图书，一类是宣扬封建正统文化的，一类是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原则相吻合。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早期维新派，不满足于洋务派对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引入，主张政治改革，大胆传播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使译书的内容更加广泛。教会出版物也日加丰富。1887年成立的广学会所出版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给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议论变法、改革政治提供了参考依据，翻译书的原著也从英、法文扩大到俄、日文。甲午战争以后，舍旧图新成为读书、藏书的一时风尚。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①无论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学说的著述，还是林纾等翻译的《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文学作品，均成为当时鼓吹政治、社会改革的思想武器。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都孕育出一批适合时代发展的图书。图书出版物的增加，也为近代新式藏书机构——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维新人士在主张变法时已认识到培养人才、建立公共藏书机构与国富民强之间的关系。由于维新派的广泛宣传和身体力行，公共藏书思想渐深入人心。至民国年间，公共藏书已发展为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的主流。同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传播的深入，不仅使图书的内容愈加丰富，而且使图书的类型也相应变革。报刊、杂志大量涌现，使中国近代藏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有所扩大和发展。

^①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59页，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

二、经济因素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近代公共藏书思想建立的经济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的建设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巩固和繁荣而由会员图书馆向公共图书馆转变的，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是西方公共藏书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根基。

在鸦片战争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鸦片战争以后，在江浙、广东沿海带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加快，并诞生了不少富贾豪商。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也同样是文化兴盛之地。资财雄厚的官吏、富商，雅好收藏，广罗古籍，斥巨资编刻丛书。由于经济生活的发达，典籍流传、刊刻的速度和规模大大加快和提高，典籍的商品化特征也日益明显，为近代私家所藏典籍辗转流入公藏创造了适宜的经济环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民间投资经商风气渐浓，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集资共享式会员图书馆和开明官吏士绅捐资兴办的公共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中国近代公共藏书设施普遍建立。然而由于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及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及基于此而诞生的各种文化设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这也是中国近代公共藏书机构虽已建立，但却远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学术影响

清末学风的演变对士子藏书嗜好的影响比较直接。过去以经学八股取士，故读书人多重经部、集部。“经部者为研究国学，

专精某经之用；集部者，为摹拟古文，以备得科举后，为人撰碑铭传序，所谓敲门砖者也。至于子、史两类，乃藏书家所搜辑，以备四部，及考据家参考，以炫博学，非普通一般所阅读也。”^①明、清藏书家所列书目，以宋、元本为重，间及抄本秘籍。至清乾、嘉朴学兴盛时，考订、训诂蔚成风气，学者讲求实学，士大夫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搜求考据记载著述，但所及范围不广。至清末李慈铭、叶德辉首倡“版本之书”与“学术之书”的界限，缪荃孙也持此种观点，引起学者的注意。李慈铭对清中期后出现的以考据为名而投机取巧的学风批评道：“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槧，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得一缺折之臆器，亦未尝辨也，随摹一刻画，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问及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不可痛乎！”^②

光绪年间，由于民族危机的加重，同时也因为这种埋头于故

^① 谢兴尧：《书林逸话》“旧书业之转变”，《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17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②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12，“札记”，同治壬申（1872）十月初八日，第1283—128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纸堆中知古而不知今的学风无补于时艰，因而在复古思潮盛行的同时，衰落了一千多年的今文经学又以对立的姿态兴起，讲求经世致用。受两种学风的影响，一面是嗜古好旧的藏书家广购宋元秘本、古刻旧刊；另一面是改革派倡言变法，广开书藏，以开民智、育人材，并对中国传统藏书进行分析和评判。民国初年，振兴国学、保存国粹的嗜古之风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公藏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公共藏书机构的设立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并使中国传统嗜藏观发生重大改变。

四、文化因素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对藏书活动的影响较大。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过渡性，这种特性的文化表现是几股文化潮流的冲突与混合，而每一次碰撞和容纳，对藏书活动均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强制性输入。近代闯进中国门户的西方人有官员、军人、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势力，其相互配合遂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整体力量。西方的政治、军事势力曾使清朝皇室藏书及私人藏书大量损毁、散佚，其对中国藏书文化发展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的经济、文化势力，尤其是作为西方文化推行者的传教士，在中国编报印书，促成近代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在中国广为使用，使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逐渐让位于更加先进的石版、铅字印刷，加速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向近代藏书文化转变的进程。可见西方文化的强制性输入对中国近代藏书活动曾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并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新学和旧学的冲突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新学的特点是讲求实务、放眼世界。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郑观

应，以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新学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新学的兴起使中国近代出版业繁荣一时，并带动了大量西学新书的出版，使近代读书、藏书的内容、形式及范围扩大，并对中国近代公共藏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新学兴起的同时，封建正统文化处于退守的地位。在鸦片战争后，传统儒学思想日益受到挑战。西学的引进和新学的兴起，以至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均意味着封建旧文化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在战乱、社会动荡及新学勃兴时，传统典籍因无补时艰而一度遭冷遇。20世纪初以来，儒家文化虽失去了正统地位，但复兴、守护儒家文化之说从未停止。作为旧学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重要代表的中国传统典籍，自然受到好古人士的珍护。

然而人们对旧学的喜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光绪末年，受学风变化影响，传统经、史、子、集在读书人尤其是藏书家心目中的位置发生转变。当时刘师培、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专表扬明季史实”，并强调诸子的地位，加之清廷废止科举，四部书中之经、集渐趋消沉，子、史代之而兴。至1927年后，此风更盛，尤其是子、史中如明代关于奏议、纪事之旧书抄本及各省方志书，最受欢迎。

清末民初之际，思想文化领域内思潮迭起，斗争激烈，中体西用、中西调和、国粹论、全盘西化论等此起彼伏。1912年1月，中华书局陆费逵等人即标出其出版宗旨为“融化国粹欧化”。同年11月创刊的《学艺杂志》中有《文学与国家关系》一文说：“求欧化而兼重国粹可也，弃国粹而偏重欧化不可也。”这种调和中西、融和新旧的意识在“五四”前后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当然爱好中国古籍秘本的并非都是固守传统的人士，但有一

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近代藏书家都多少接受了旧学的熏陶，他们与旧学的联系并没有因新学、西学的兴起而割断，甚至有不少新学、西学的鼓吹者又渐渐归复旧学，如胡适曾于 1922 年 5 月和 1923 年 1 月创办了《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提倡整理国故。受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争相影印古籍，受到公私藏书机构的欢迎。

归复旧学可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影响，同样也能征示出近代藏书家在社会剧烈变动中对传统文化的复杂依恋心态。而近代公共藏书中旧籍占绝大比重的事实，也多少能说明旧学在近代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在近代文化中还有一不可忽视的便是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文化。无论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战争、反洋教运动，还是农民革命运动，人民大众（如农民、手工业工人、城镇居民、知识分子）除直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外，还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各种文化武器。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一共印发了 30 多种宣传小册子，在社会曾广为流传。在群众文化中孕育、诞生的诸如小册子、揭帖、宣传画等等，不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书籍形态的新方式，也为近代藏书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

五、科技影响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近代藏书活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 世纪初，西洋铅印术已传到我国沿海地区。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先进的印刷术经不断改进，已非常适宜于印刷中文书刊，当时大多中文报刊均采用这种新式印刷术，如《遐尔贯真》、《香港新闻》、《华文日报》、《循环日报》、《中外新闻》、《中外新报》、《六合丛谈》及《申报》等。在维新运动日渐高涨时，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望非常迫切，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出版刊物的需要，

而我国固有的雕版印刷术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西方印刷术遂普遍用于图书报刊上。1902年以后，新式学校建立，教科书、地图和教学参考资料为群众所普遍需要，加上各种商业印刷品，如证券、股票、广告、月份牌等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增多，更使新式印刷术得到巩固和发展。新式印刷术的出现，不仅使图书的内容、品种增多，也使中国书籍的形式产生了变革，即由传统的线装改为精装、平装，同时刊印古籍也更为方便，如用西方传来的照像石印（缩印）技术，曾出版《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等。

近代先进印刷技术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运用，对古籍收藏和旧书业带来强大冲击。如商务印书馆辑印的《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等，“其内容则经史百家，包罗万有；其价值则宋元善本，名家校藏。在昔时士庶之家，一部犹不可得者，至此以千余元即可集古今图书之精英，其有关学术文化之普及，与夫善本书籍之流传，影响之巨，不仅中外钦崇，实自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而后，数百年来，无此大成绩也。”继商务印书馆之后，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亦争相影印、排印古籍，以至对旧书业产生极大影响。当时书贾曾颇为担心地说：“照此情形，不到十年，全国旧书业将为商务诸家所侵并消灭。”^①随着影印古籍的增加，原本对藏书家来说极富考据、校讎、研究价值的秘本珍籍，由于其实用价值已被新印古籍所取代，因而愈益形同古玩了。

新式印刷技术不独为出版家所掌握，公私藏书机构也把这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古籍的传布上。如北平图书馆所印善本遗稿数十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天禄琳琅丛书》及其他文献史

^①谢兴尧：《书林逸话》，《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431页。

料，其他如北大、燕京、清华各校也多有印行。而“每印出一种，旧书业即受一种影响与打击。如燕大近印《清代进士题名索引》，于是凡清之《馆选录》、《进士同年录》等，皆属无用。”^①书商为了生存，也相率自印，如文殿阁所印《国学文库》，共出 38 种，均为不易得或极贵的旧书。但限于书源、财力及学识，书商所印古籍，极难与各文化机关相比拟。

其实，为藏书家提供丰富收藏之旧书业不仅受近代新式出版印刷技术的冲击，自道光、咸丰以至光绪，藏书家及学人刊刻丛书的风气，已殃及旧书业，只是民国时影印古籍的规模与数量之庞大，使其对与藏书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旧书业的冲击更加明显。

六、近代出版业

中国古代出版活动以分散的家刻、官刻、坊刻为主，与当时的政治及社会进步等的联系均不够直接和密切。而近代出版活动，却直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演变过程。每当民族危机之际，都伴随着民族的觉醒和出版业的冲动。甲午战后、辛亥革命、1927 年、1937 年，莫不是中国近代的出版高潮。这种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和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向，便是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的主流，这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直接和显著的影响。

中国近代出版业由教会出版机构和清政府的官书局开其端绪。教会出版的书籍以宗教内容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从 1819 年至 1875 年的 50 多年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印行了 1036 种书刊，内容大部分为宣传教义，也间有一些语言、科技类图书。在中日战争前，教会出版物为一般人士所排斥。甲午战争以后，

^①谢兴尧：《书林逸话》，《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 430 页。

“广学会刊行林乐知的《中东战争本末》，因持论公允，记载翔实，为当时唯一可靠的战时读物，海内争相传诵，国人对于教会出版物的态度大变，尤其欢迎广学会的书籍。”^①

清政府的官书局在洋务运动时已雇外人翻译西方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作占此时期译书总数的70%以上。同文馆成立40年译书26部，以译法政书籍为主；江南制造局在1871—1905年间出版译书178种，其中有关自然科学的6种，军事38种，工程和制造的35种，医学11种，农业7种，历史和制度21种。^②由于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宣扬旧学的书籍仍占有市场，这与清末官书局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的出版方针不无联系。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变法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译书的内容发生变化，即完成了由此前的以兵工实用科学为主，至重视自然科学，再到广译社会科学、哲学书籍的转变。徐维则编纂的《东西学书录》收录1896—1898年出版的图书，其中工艺和兵制两类占总数的19.3%，自然科学类书籍占总数的40%。1904年顾燮光所编《译书经眼录》中，兵法、工艺类书仅占6.2%，自然科学类降至23%，法政等社会科学书籍已上升为占总数的61.5%，关于史地、文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译书也逐渐占有重要比重。

在维新运动前后，民营出版业开始发展，并很快取代教会和清政府官书局出版机构而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发展的重心。1881年，经营石印业务的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创立，打破了由西人美

①李泽彰：《三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1931），《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第383页。

②魏元慕：《江南制造局记》卷2，上海1905年版。

查开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独揽石版印刷业的局面。1897年,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成立。1901年,清廷宣布废八股,兴学堂,使用新书,促进了印刷工业的发展,使用机器印刷的民营印刷厂相继诞生。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已有包括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点石斋书局、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等22家成员。^①之后,民营出版印刷业迅速扩展至宁波、广州、杭州、武汉,进而向全国各地蔓延。在清末学部第一次审定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时,共计有102册,由民营出版业发行的计85册,占4/5强。^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行的自由。几年之后又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出版界出书的数量大增。清末民初所出新书主要为教科书、法政书及小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杂志、丛书大增,东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最多。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新图书馆运动对出版业的繁荣有很大促进作用。图书馆运动所强调的保存文化、建设文化的主旨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宗旨。而出版业的发达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图书馆运动发展中的缺陷。此时大量出版的书籍,一为强调阐扬国粹,这与保护文化相契合;一为“植普通图书馆之基”,此与建设文化共匹配。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出《万有文库》,不仅使新图书馆运动所面临的经费支绌、管理人才缺乏、相当图书难以购置的困难迎刃而解,而且也使出版界竞相效仿。1930年,中华书局发售《殿版二十四史》,商务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些书籍的相继出版,对图书馆运动均有很大帮助。

① 《图书月报》第1期,上海书业商会1906年6月出版。

② 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出版业》(1897—1931),《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下编下卷第384页

出版业是中国近代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行业。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出版业茁壮成长；至 30 年代前后，已相当发达。以当时我国三家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为例，自 1927—1936 年 10 年的新出版物数量，除 1932 年商务印书馆惨遭日军轰炸或其他特殊原因而影响出版外，每年均呈递增发展趋势（见表 1），而且 1936 年的出版量较 10 年前已增长近 7 倍，而其中许多书籍都为公私藏书机构购置、贮藏。

表 1 1927—1936 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出版新书统计^①

数量：册（种）

出版机构 \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商务	842	854	1040	957	787	61	1430	2793	4293	4938
中华	159	356	541	527	440	608	262	482	1068	1548
世界	322	359	483	339	354	317	571	511	391	231
总计	1323	1569	2064	1823	1581	986	2263	3786	5752	6717

1934—1936 年，当时全国每年新出版物的册（种）数是：1934 年为 6197 册，1935 年为 9223 册，1936 年为 9438 册，而商务印书馆年出新书，有时竟占全国总数的半数之上。依据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出版新书在全国总出版新书中所占的比例，即 1934 年占 61%，1935 年占 62%，1936 年占 71%，其平均数为 65%，可推算此前全国出版新书的情况（见表 2）。

^①王云五：《十年来中国出版事业》（1927—1936），《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 336—337 页。

表 2 1927—1933 年全国出版新书统计^① 数量：册（种）

出 版 机 构	年 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三家已知数		1323	1569	2064	1823	1581	986	2263
全国推算数		2035	2414	3175	2806	2432	1517	3481

新版图书的种类，以总类图书所占比重最大，因大部丛书均包括在内；社会科学占第二位，因教育图书、小学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均收入其中；以下依次是文学、史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

近代出版业发展迅速，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如教育的普及，社会的进步，以及近代藏书观念和风气的转变，而出版家自身的努力及其适时的发展尤不可忽视。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版物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媒介。群益书社发行的《新青年》，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世界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中华书局发行的《解放与改造》刊物和《新文化丛书》，均迎合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时代潮流。1919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成为发行新文化书籍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巨头。至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包括杂志）共计8039种，18708册。1932年1月28日商务因日军轰炸上海而惨遭劫运，但并未因此重创而停滞不前。在劫后复兴的5年间，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物种类约相当于此前35年全部出版物的85%。

^① 王云五：《十年来中国出版事业》（1927—1936），《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336—337页。

册数为 769。在出版界竞争日趋激烈的近代中国，其他出版机构也不甘寂寞。中华书局在 1927—1934 年间，每年新出版书籍没有超过 700 册的，1935 年骤然突破千册大关，1935 年猛增至 1548 册。后起之出版社虽难与商务、中华匹敌，但也追求自身之发展，像正中书局，1935 年出书 139 册，1936 年增至 392 册。正是因为有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具有丰富出版经验，并肩负保存文化、建设文化使命的出版社，才为近代公私藏书机构创造、生产了丰富的收藏品，同时也为近代藏书文化的演进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

*

*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科技及出版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藏书活动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革变法实践，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起了至为关键的刺激、引发作用。中国悠久的藏书传统和较为发达的皇室、私人、书院藏书实践，在近代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或衰落，或发展变异，最终并入近代公共藏书文化的主流之中。

第二节 古代藏书及其在近代的衰落

一、古代藏书的特点

我国藏书历史悠久，商周时期已有了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藏书机构。周朝史官负执掌藏书之职，专事国家典籍的收藏管理工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出现，百家争鸣，原本为官府垄断的藏书渐及于民。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皇家藏书和私人藏书成为中国藏书发展史中的两大支柱。书院在唐代产生之初原本

也为中央政府的藏书之所，后其教育功能逐渐突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藏书体系。此外，不少道观、佛寺也有藏书建置，而且收藏规模并不亚于西方教堂的图书收藏，但寺观藏书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不大，故本文略而不述。以下试简要分析我国古代三代藏书系统的特点。

1. 皇家藏书的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以皇权专制为主要特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家藏书除皇室所藏外，也包括官府藏书，而它们均具有有限使用、疏于管理、旋聚旋散等特征。

(1) 从图书专制到有限使用

在封建社会发展初期的秦汉时期，统治阶层就十分重视藏书建设，广置图书，但对藏书内容和使用的控制极严。秦代为加强封建主义思想专制，凡《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收藏，史官所藏不属于秦国所记的历史书籍一并焚毁。汉代时，国家藏书总量已达到万卷之多，但除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外，其他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否则给予严厉的制裁，目的是为巩固皇权，以防诸侯王谋反。

至唐、宋以后，封建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文化事业繁荣，国家藏书的利用率也显著提高。宋代宫廷内府藏书对皇室宗族开放，政府藏书对官吏开放。在科举考试殿试时，集贤书库负责提供图书，官吏及大臣子弟因工作需要而至馆阁查阅图书资料已是常事。甚至一些书库的图书还可以外借。如宋版《大易粹言》卷末纸背有记云：“国子监崇文阁书，借读必须爱护，损坏缺损，典掌者不许收也。”^①

^① 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2，长沙王氏刊本。

清代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在禁毁一批图书的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促进官私收藏，致使清代皇家藏书规模恢弘，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南北七阁藏书，即内廷四阁（也称北四阁）和江浙三阁（也称南三阁）。北方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是皇家藏书楼；江浙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虽是国家藏书，但对士子开放。考虑到江浙为“人文渊薮”，为便于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清廷下令由国家拨款抄录三份《四库全书》分藏于内。当时地方官员恐士子翻阅污损，便珍秘保存。乾隆帝为纠此弊宣称：“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①南三阁藏书对士子开放，不仅在传播古代文化和繁荣学术研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为当时及后世文人感怀不尽。

（2）广收博采，疏于管理

历代封建王朝在建朝之初无不重视藏书建设，广购秘籍，博采遗书，大兴编纂、刻书之事。宋代编纂的大型图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明代的《永乐大典》，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皇家藏书的便利。然而每到王朝的中后期，皇帝不重视藏书，官府疏于管理，皇室和官府藏书多沦落私人之手。正如宋代沈括所称：“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②

明、清时期，皇家藏书除被盗窃遗失外，宫廷内屡屡发生的火灾也殃及图书。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宫殿失火，所藏宋、元以来善本焚毁净尽。此后皇家藏书日渐匮乏。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传能、张萱等清理文渊阁藏书并编出

①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谕。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1第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12月版。